

西红柿名称的构词逻辑研究-基于形态联想与来源标注的跨语言视角

何鹏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湖南 株洲 412000)

摘 要: 本文以西红柿名称为研究对象, 基于形态联想与来源标注的双重视角, 结合文字学、语言学与跨文化研究方法, 探讨其构词逻辑及跨语言演变规律。研究发现, 汉语中“西红柿”“番茄”等称谓遵循“来源标注词(西/番/洋)+形态类比词(柿/茄)”的双轨模型, 既通过本土植物类比实现认知驯化, 又以前缀语素记录传播时空轨迹。历时维度上, “胡-番-洋-西”前缀的更迭勾勒出中国对外交流的空间转向; 共时层面, 中日韩等跨语言对比呈现出意译标注、纯音译、形态描述三种典型命名范式。文字学视角下, “柿”字的形义演变与语义泛化, 印证了汉语植物命名“特征复合”的认知偏好。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外来作物命名背后的语言编码智慧, 更以微观词源为切入点, 折射出全球化进程中文明交流的深层逻辑。

关键词: 构词逻辑; 形态联想; 来源标注; 跨语言对比

一、引言

智利诗人聂鲁达在《番茄颂》中赞美番茄: “番茄, /这地上的星辰, /这随处可见的, /丰产的星辰…”, 以此引出其跨越地域的文化符号性。这种原产于南美安第斯山地带的植物, 在不同文明中衍生出迥异的认知: 古罗马医生将其命名为“lycopersion”(狼桃), 源于希腊语“狼”与误译的“桃子”组合, 折射出欧洲早期的恐惧想象;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 其红色果实被赋予“喜报三元”的吉祥寓意, 形成鲜明的认知反差。这种命名差异背后, 隐藏着物种传播史中语言对异域事物的编码逻辑。

作为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典型物种, 番茄的传播轨迹清晰可辨: 阿兹特克人称其“xitomatl”(胖乎乎的肚脐水果), 经西班牙殖民传入欧洲后演变为“tomate”, 最终成为现代英文“tomato”。传入中国后, 明代文献《群芳谱》(1621)记载其“来自西番”, 称“番柿”, 清代《黑龙江外记》则出现“洋柿子”称谓, 这些命名共同指向“形态联想+来源标注”的双重建构逻辑。本研究将从文字学(“柿”字构形)、语言学(“西/番”前缀功能)、跨文化(中日韩命名对比)三个维度展开, 揭示“西红柿”与“番茄”等称谓的历时演变关系, 解析命名背后的认知机制与文化密码。

核心研究发现: 西红柿名称的形成并非简单的“西方传入+形似柿子”组合, 而是通过“来源标注词(西/番/洋)+形态类比词(柿/茄)”的双轨模型, 实现对异域物种的认知驯化, 这一过程既反映明清时期的对外交流特征, 也体现语言符号的创造性转化。

二、西红柿名称的构词逻辑解析

作者简介: 何鹏(1988), 男, 硕士研究生, 会计师,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 研究方向为聚焦于管理会计工具在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的应用等。

西红柿名称的形成蕴含着汉语对外来物种的双重认知逻辑：既通过形态联想实现本土经验迁移，又借助来源标注构建时空定位坐标。这种命名范式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植物认知体系中“以熟喻生”的思维模式，即通过已知植物特征类比未知物种。

（一）形态联想：以“柿”为核心的认知锚点

西红柿传入后，古人首先捕捉到其与本土柿子的形态共性——成熟果实的圆润轮廓、鲜红色泽（部分品种橙红）及软嫩多汁的口感，这种感官体验的高度相似性，促使“柿”字成为命名的核心语素。北魏《齐民要术》记载柿树栽培历史已超 2500 年，其“朱果”“猴枣”等别名印证了“柿”在传统植物谱系中的稳固地位，为外来物种的类比命名提供了认知基础。这种“以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机制，与绿春哈尼族人通过颜色、触感等典型特征命名植物的逻辑一脉相承，体现了人类认知中“从具象特征到抽象指代”的共性规律。

（二）来源标注：“西-番-洋”的时空语义演变

为区分本土柿子，汉语通过前缀语素构建了外来物种的时空谱系。“西红柿”之“西”明确指向其经欧洲传入的路径，而“番茄”之“番”则暗含早期海上传播的历史印记。明代《群芳谱·果谱》（1621 年）记载“蕃柿，一名六月柿……来自西蕃”，清晰呈现“番”字作为海域贸易时代外来作物标注词的功能。这种命名差异实质是汉语对外来事物分类体系的体现：“番”多用于宋元以降东南沿海传入物种（如番薯、番椒），“西”则强化明清时期欧美来源属性，而民国《呼兰县志》记载的“洋柿”（俄罗斯种）进一步丰富了来源标注的维度。

命名逻辑对比

- 西红柿：侧重外形类比（柿）+ 方向来源（西方），体现北方传播路径的认知特征
- 番茄：强调植物属性（茄科）+ 邦国来源（番邦），反映早期海上传入的命名习惯

这种双重构词逻辑不仅完成了外来物种的本土化语言编码，更通过《群芳谱》等文献记载，将物种传播史凝固为可解读的语义化石，为研究大航海时代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语言学佐证。

三、汉语外来作物命名的规律与类型学特征

汉语对外来作物的命名实践构建了一套融合形态认知、地理记忆与文化编码的复杂系统。基于历史文献与方言数据的分析表明，这一系统可通过“三维命名模型”进行解析：形态维度以植物的感官特征为核心，如“苦瓜”以味觉命名；来源维度通过空间标识追溯传播路径，如“胡椒”标注西域产地；文化维度则将植物纳入象征体系，如“佛手柑”的宗教隐喻。这种命名逻辑既延续了中文植物命名“观物取象”的传统——注重形态、习性与生长环境的具象描述，又发展出独特的外来性标注机制。

历时演变中，“胡-番-洋-西”四组前缀构成汉语认知外部世界的时间坐标。两汉魏晋时期西北陆路传入的“胡”系列（胡麻、胡瓜），南宋至明通过“番舶”引入的“番”系列（番茄、番薯），清代以降的“洋”系列（洋葱、洋芋），以及近代“西”系列（西红柿、西兰花），清晰勾勒出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空间转向。其中“番”与“西”的替换尤具代表性：明代《群芳谱》记载的“番柿”，折射出早期海疆贸易语境下对“西番”产地的模糊认知；而清代“西红柿”的命名，则反映地理大发现后对美洲作物来源的精确方位判断。这种语义嬗变本质上是文化地理认知的语言投射。

共时层面的方言变异进一步揭示命名系统的弹性机制。北方“洋柿子”（华北、东北）、南方“番茄”（粤闽沿海）、山地“毛辣角”（云贵川交界）等称谓^[5]，在建水方言中形成“酸汤果”（味觉描述）与“状元红”（科举文化隐喻）的南北对立格局。这种变异既受传播路径影响——如菲律宾传入的“马铃薯”因运输方式得名，也与地域文化深度耦合，如“女儿果”

的贫困山区命名、“柑仔蜜”的闽台味觉表达。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方言变体如何多元，其结构均遵循“修饰语+中心语”的汉语构词规则，修饰成分可归纳为外来义（番）、性状义（甜、红）、文化义（状元）等六大类，显示出深层语言结构的稳定性。

三维模型的互动关系：形态、来源与文化维度并非孤立存在。明代“番柿”既标注“西番”产地（来源），又以“柿”类比形态特征；当代“番茄”则在“番”的来源标识外，叠加“茄”的形态比附与“红”的颜色描述。这种多维融合机制，使汉语外来作物命名既保持认知的连续性，又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

从“番椒”到“辣椒”的名称更迭，从“洋茄子”到“番茄”的标准化进程，汉语外来作物命名始终在“外来标识-本土认知-文化适应”的张力中动态平衡。这种平衡不仅记录着物种传播的物质史，更蕴含着中华文明对异质文化的认知策略与编码智慧。

四、跨语言视域下的西红柿名称对比研究

西红柿名称的跨语言差异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文化接触图谱，通过“命名策略光谱”可清晰识别三种典型范式：汉语的意译双轨制、日韩的纯音译路径及阿兹特克语的形态描述传统。这种命名分化不仅反映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更揭示作物传播史中的权力关系与文化选择。

（一）汉语命名的双轨标注体系

汉语对西红柿的命名呈现语义透明度优先的特征，“西红柿”（西方红色柿子）与“番茄”（外来茄子）均采用“来源标注+本土参照物”的复合结构。这种双轨制既保留“胡/番/西”等历史移民作物的命名传统（如番薯、胡椒），又通过“柿/茄”等本土植物类比降低认知门槛。藏语“ཁི་མེ་ལྷོ་ཁྱུ་ཤིང་།”（红色的果子）进一步印证汉藏语系对颜色-形态特征的优先编码策略。

（二）日韩语言的音译选择与历史层积

日语中西红柿名称的演变构成语言西化的微观标本：早期采用“唐柿”（唐代传入的柿子）等汉字意译，明治维新后逐渐被片假名“トマト”（tomato）取代，与“アスパラガス”（芦笋）、“カリフラワー”（菜花）等西方蔬菜译名形成体系。这种转变与“林檎→りんご”（苹果）的本土化路径形成对比，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取向。

韩语“토마토”的形成则体现殖民语言接触的层级性：作为英语借词，它与日语“トマト”共享发音内核却承载不同历史记忆。与“倭芥子”（早期辣椒名）等中日借词相比，“토마토”的纯音译特征暗示近代以来英语在东亚语言接触中的主导地位。

（三）词源传播的跨大陆轨迹

西红柿名称的全球旅行始于阿兹特克语“xitomatl”（胖乎乎的肚脐水果），这个兼具形态描述与文化隐喻的命名，经西班牙殖民者改造为“tomate”后进入欧洲语言体系。从纳瓦特尔语“tomatl”到西班牙语“tomate”，再到日语“トマト”与韩语“토마토”，语音形式的保真度远超语义传递，形成一条跨越四大洲的语言传播链。

命名策略光谱

1. 意译标注型：汉语“西红柿”（来源+形态）、藏语“红色的果子”（特征描述）
2. 音译借用型：日语“トマト”（英语借词）、韩语“토마토”（英语借词）、维吾尔语“[بومينور]{dir="rtl"}”（俄语借词）
3. 形态描述型：阿兹特克语“xitomatl”（肚脐水果）、西班牙语“jitomate”（保留纳瓦特尔语词根）

这种命名差异本质上是文化认知框架的语言投射：汉语通过语义重组完成外来事物的本土化编码，日韩通过语音移植实现现代性对接，而阿兹特克语则展示了原始命名对生物特征

的具象把握。当“トマト”与“西红柿”在当代餐桌上相遇，两种命名策略背后是千年农业文明与五百年全球化进程的对话。

五、文字学视角下“柿”字的形义演变与认知隐喻

（一）构形分析：“木+市”的形义共生关系

“柿”字的构形本质体现了汉语植物命名的认知智慧。作为典型的形声字，其甲骨文未见，篆文形态从木（表植物属性）、市声（后演变为“市”），隶变后楷书规范为“柿”。许慎《说文·木部》明确界定“柿，赤实果”，既揭示其“红色果实”的形态特征，又暗示“市”声旁可能承载的语义关联——《礼记·内则》“棘栗榛柿”的记载，佐证其早在先秦已成为市场流通的重要果品，形成“可交易的红色果实”这一构义场。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文献提出“柿”字或含会议元素：篆文中“市”部模拟古代市场叫卖场景，与“木”部结合形成“可叫卖的水果”的意象化表达，这种形义互动使其区别于单纯表音的形声结构。

（二）语义演变：从特指到泛指的范畴扩展

“柿”的语义场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典型扩展路径。本义特指柿树（*Diospyros kaki*）及其果实，如《群芳谱》对其形态描述：“叶椭圆形或倒卵形，花黄白色，浆果橙黄或红色”。随着物种交流，其语义逐渐泛化——明代文献已出现“六月柿”“番柿”等称谓，将形似柿子外来作物纳入“柿”的范畴^[7]。这种扩展机制与“苹果”从古称“林檎”到现代名称的更替形成对照：前者保留核心语素“柿”构建隐喻关联，后者则完全替换旧称，反映汉语植物命名中“形态相似性”优先于“谱系关联性”的认知倾向。清代以降，北方方言更直接将西红柿简称为“柿子”，使“柿”从专有名词演变为果实形态的范畴标记。

（三）认知机制：跨语言复合隐喻的类型学对照

“柿”字的构词逻辑揭示了汉语“特征叠加”的认知偏好。其核心隐喻结构可拆解为“颜色（赤）+ 形态（果实）+ 功能（商品）”的三维复合，与哈尼语植物命名形成鲜明对比。哈尼语称西红柿为“酸汤果”，采用“味觉（酸）+ 形态（汤状汁液）”的复合标注，体现“感官体验优先”的认知策略^[12]。这种差异在福建话“红柿”（强调颜色）与普通话“西红柿”（“西方来源+柿形”）的对比中更为显著：前者遵循单维度特征提取，后者则融合来源地信息与形态类比，构成“时空-形态”的双轴标注体系。

认知类型学启示：汉语植物命名存在“特征复合度”梯度差异——从“柿”的二维标注（颜色+功能），到“西红柿”的三维标注（来源+颜色+形态），呈现出对复杂信息的层级化编码能力。这种编码模式与英汉植物命名的共性规律（如“松”象征坚韧）形成互补，共同构建了人类对植物世界的符号化认知地图^[14]。

从文字学视角看，“柿”字犹如文化基因的活化石：其形义演变记录了农业商品化进程，语义扩展反映物种交流史，认知机制则揭示了汉语构词的隐喻创新能力。当现代人称“西红柿”时，实则在使用一个融合商周形声智慧、明代物种交流记忆和当代认知习惯的复合符号，这正是汉字系统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六、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西红柿名称构词逻辑的跨语言考察，在三个维度形成核心洞见：语言学层面，提出“接触语言学中的命名策略连续统”理论框架，揭示意译（如“番茄”）、半音译（如“西红柿”）与纯音译（如“圣女果”源自英文“Tomato”）的动态演化规律；文化层面，以名称演变为镜像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的认知互动史——从明末作为观赏植物的“番邦异物”记载，到民国时期栽培范围扩大，最终发展为当代“日常食材”，完成从文化边缘到饮食中心的转变；

方法论层面,示范“微观词源-宏观类型学”的研究路径,通过方言称谓的文化基因解码(如“洋柿子”“火柿子”等地域变体),构建语言接触研究的新范式。

参考文献:

- [1] 韩淑红. 汉语外来词历史分期研究综述 [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 3 (2): 112-117.
[2] 李乐毅. 百年汉语外来词研究热点述要 [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26 (3): 135-140.
[3] 杨华, 陈颖. 语言规范视角下外语词本土化维度思考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5, (4): 89-97.
[4] 王思明. 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 [J]. 中国农史, 2013, 32 (4): 3-15.
[5] 赵岗. 近十年来美洲作物史研究综述 (2004-2015) [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6, (1): 105-112.

A Study on the Word-Formation Logic of Tomato Names: From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Based on Morph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Source Labeling

HE Peng

(CRRC Zhuzhou Electric Locomotive Co., Ltd., Zhuzhou, Hunan 412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names of tomato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morph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source labeling, and combines philological, linguistic,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ir word-formation logic and cross-linguistic evolution patterns. The study finds that Chinese terms such as "xihongshi" and "fanqie" follow a dual-track model of "source label (west, foreign, overseas) + morphological analog (persimmon, /eggplant)", which not only achieves cognitive domestication through analogy with local plants but also records the spatiotemporal trajectory of dissemination through prefix morphemes. In the diachronic dimension, the evolution of the prefixes "hu-", "fan-", "yang-", and "xi-" outlines the spatial shift of China's foreign exchanges. At the synchronic level,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s among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etc., reveal three typical naming paradigms: meaning-based labeling, pure transliteration, and morphological description. From a philological perspective, the form-meaning evolution and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of the character "shi" confirm the cognitive preference for "feature compounding" in Chinese plant naming. This study not only reveals the linguistic coding wisdom behind the naming of foreign crops but also uses micro-etymology as an entry point

Keywords: word-formation logic; morphological association; source labeling;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